

译文经典

小说面面观

Aspects of the Novel

E. M. Forster

〔英〕E·M·福斯特 著

冯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经典

小说面面观

Aspects of the Novel

E. M. Forster

〔英〕E·M·福斯特 著

冯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面面观/(英) E. M. 福斯特著;冯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5

(译文经典)

书名原文:Aspects of the Novel

ISBN 978-7-5327-8115-7

I.①小… II.①E… ②冯… III.①小说评论—英国—现代 IV.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8027 号

E. M. Forster

Aspects of the Novel

Edited by Oliver Stallybrass

Copyright © The Provost and Scholars of King's College, Cambridge, 1927, 1974

Introduction and other editorial matter Copyright © Oliver Stallybrass, 197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nguin books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4-092号

小说面面观

[英] E·M·福斯特 著 冯涛 译

责任编辑/顾真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插页 6 字数 139,000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978-7-5327-8115-7/I·4989

定价:39.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39-2925659

E·M·福斯特谨将
《小说面面观》献给
夏尔·莫龙^①

① 莫龙(Charles Mauron, 1899—1966), 法国科学家、批评家、翻译家, 曾致力于将当时的英国文学译介到法国, 是福斯特作品的主要法译者。——译者

编者导言

福斯特有个积习，每到年关，辞旧迎新之际，总要重新翻检一遍一年来的日记，细细估算一番一年来自己肉体和精神健康、声望和运道的收支账。逢到这种情况，他的笔触总是更加欣然地倾向于自责和自怜，而非相反的方向；于是，一九二七年在他的笔下就成为：

艰难的一年，回顾起来我备感欣慰，自觉在……金钱和声望上都收获颇丰。用掉约六百镑，本可以花得更多。讲座（一至三月，十月出版）大获成功。在人文剧院^①赢得大量听众且因此成为国王学院之研究员。

“讲座”即年度克拉克讲座，由剑桥三一学院主办，在关于英国文学领域的系列讲座中或许是最著名的。从莱斯利·斯蒂芬^②和艾德蒙·格斯^③到燕卜苏^④和瑞恰慈^⑤，克拉克讲座不但将著名或一度著名的评论家和学者网罗殆尽，而且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间还不时邀请到文学人文领域的著名从

业者，譬如说历史学家、戏剧家或者诗人担任讲席。而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学年，这项荣誉头一次落到一位小说家头上；这位小说家就是当时广受赞誉的小说《印度之行》的作者。

福斯特很高兴受到邀请，却对是否接受踌躇不决；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他在写给印度朋友赛伊德·罗斯·马苏德^⑥的信中道：

刚收到剑桥三一学院克拉克讲座的讲席邀请，还是挺兴奋的——今秋或是明春就英国文学做八次讲座，有两百镑丰厚报酬。要是能鼓起勇气我就接受邀请。^⑦

一方面是报酬的丰厚，是略为不安地明知自己并没有在

① 并非如今的剑桥人文剧院，为当时一同名大学讲堂。——编者

② 斯蒂芬(Sir Leslie Stephen, 1832—1904)，英国文人，评论家，《英国传记词典》的第一任主编。著名作家弗吉妮娅·伍尔夫之父。——译者

③ 格斯(Sir Edmund Gosse, 1849—1928)，英国翻译家，文学史家和评论家。——译者

④ 燕卜苏(Sir William Empson, 1906—1984)，英国诗人，评论家，曾任教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诗作有《诗歌》，论著有《晦涩的七种类型》等。——译者

⑤ 瑞恰慈(I. A. Richards, 1893—1979)，英国文学评论家，诗人，新批评派主要代表人物，著有《文学批评原理》、《实用批评》等。——译者

⑥ 马苏德(Sir Ross Masood, 1889—1937)，印度著名教育家、政治家赛伊德·艾哈迈德·汗爵士(Sir Syed Ahmed Khan, 1817—1898)之孙，印度次大陆文艺复兴之父。在备考牛津大学时，E·M·福斯特曾受聘做过他拉丁文的私人导师，之后与福斯特成为莫逆之交。福斯特将《印度之行》题献给他。——译者

⑦ 摘自 P. N. Furbank 先生拥有的打字副本。——编者

写另一部小说或是任何实质性作品，而且首要的或许还是声望的诱惑——尤其是紧随 T·S·艾略特其后主持讲座，福斯特对他的诗是怀有一种虽说略有戒备却是相当强烈敬意的。（对 A·E·豪斯曼^①，他却认为徒有虚名；不过也许在不久后他才得知豪斯曼在艾略特之前即已受邀担任讲席，而且他不但得到允许一见豪斯曼那封措词优雅的谢绝信，而且还抄录了一份。）^②而另一方面，则是能否鼓足“勇气”的问题：其中主要的自然还不是要面向一大群主要是专业的听众侃侃而谈的考验，而是害怕这样一来，就小说这只“无害的母鸡”而言——因为不管那邀请是怎么来的，他既受到了邀请，自然知道人家对他的期望是什么——他将极易招致，尤其是来自小说家同侪，针对他前后不一的指责。福斯特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意识到“评论与创造性状态之间的鸿沟”^③；而在克拉克讲座二十年后，当福斯特应邀前往另一个剑桥^④就“批评之 Raison d'Être^⑤”发表演讲时，他仍以

① 豪斯曼(A. E. Housman, 1859—1936)，英国诗人，拉丁文学者，长期在剑桥大学任拉丁文教授，作品风格独特，情调悲观，主要诗作有组诗《什罗普郡少年》和诗集《最后的诗》等。——译者

② 豪斯曼在这封信上彬彬有礼地谢绝从“我自认胜任并乐在其中的那些琐碎而又陈腐的研究”中抽出“整整一年时间(至少要这么长时间)”。福斯特在他的备忘录中完整抄录了此信(在本书附录 A 摘录的条目之后)。另见《A·E·豪斯曼书信集》，Henry Maas 编辑(伦敦，Hart-Davis, 1971)。——编者

③ 见《为民主再次欢呼》(Abinger 版，第十一卷)118 页。——编者

④ 所谓“另一个剑桥”，是指美国的“剑桥”(一般音译为“坎布里奇”)，哈佛大学所在地。——译者

⑤ 法语：存在的理由。——译者

很不情愿地承认“反对批评的现状强大得令人担心”始，以断言批评在人文学科中没有“第一等 Raison d'Être”做结^①。既持有这样的观点，他仍然还会写的批评著作也就难怪全都规模很小，方式任性了，他宁肯通过迅速、敏锐的领悟一把抓住特点，而不愿进行详细的分析或自始至终地应用任何一种批评理论，或者希望通过八次有关“乔叟以降英国文学的某一或某几个阶段”的讲座来对文学进行剖析^②。他当真想跟克莱顿·汉密尔顿先生一较高下吗？数年前他曾拿他的《小说的取材与方法》大大地取笑过一番^③；或者跟 E·A·贝克教授分庭抗礼？不久后他还相当不敬地对贝克教授皇皇巨著《英国小说史》中的一卷说三道四，引发作者愤怒的抗议，他也不得不因此而有所保留地道歉^④。

答案或许根本没这么复杂：他当时的富足用美国的秤盘一掂可能都打不住定盘星了（《印度之行》在美国的销量

① Op. cit., pp. 105, 118.——编者

② 福斯特的表述（见本书正文第 3 页）跟一八八三年三月六日《剑桥大学报道》宣布的关于讲座使用的术语并不完全吻合。不过这些术语事实上也在不断变化：这一讲座最初一次就历时三年，总共至少须得进行六十次讲座，每年得到三百镑报酬。此前福斯特自然也就文学做过讲座，不过他曾为大学扩展教育做过的讲座是关于意大利历史的，他在工人大学（“Working Men's College”是一八五四年由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创办，英国最早向“所有人”提供基本教育的成人大学。F·D·莫里斯是主要发起人和第一任校长，E·M·福斯特是后来最著名的志愿者之一。——译者）的讲稿又须另当别论。——编者

③ 见“附录 B”收录的评论，同时也是“无害的母鸡”这个说法的由来。——编者

④ 见《旁观者》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八日，1055 页，及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二日，54 页。——编者

远远盖过了英国)，他不是豪斯曼，没什么“研究”要打断，不管它是不是陈腐，哪怕他真要婉拒，作为最后一招，他也需要扎实得多的理由，或是为虚荣心蒙上朴素和深思熟虑的外衣。不过，福斯特虽说终究接受了邀请，毕竟还是颇有些顾虑，这在他于七月十一日写给亚历山大的朋友 G·H·卢道夫的信中有所表露：

我想我之所以活着的首要责任——至少是唯一的公共责任——就是写出好书，对此我还不能说我正在尽职尽责。我把时间都花在阅读别人写的小说上了，而这是为了明年在剑桥的几个讲座做准备……我……正在硬啃《克拉丽莎·哈洛威》^①。刚刚草草对付完笛福和斯特恩，这两位读来都让我大为开心。这一切干起来都挺愉快的，而且讲座的报酬颇丰。可这跟创作没有丝毫关系。我自觉就像个木偶，真实的生命已然被抽空，而且我还一直在琢磨——恐怕以后还会一直这么琢磨下去——大部分人年过四十后难免都会变成这副德性：过得挺开心挺愉快，对什么都挺享受，占住一个空缺（占住了就再也不挪窝）：可是他们私心要保留的那点尊重却完全被放错了地方。

福斯特可能从四月份就开始从《项狄传》和《摩尔·弗

^① 《克拉丽莎·哈洛威》(Clarissa Harlowe)是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的代表作之一。——译者

兰德斯》入手“草草对付”十八世纪的小说，他备忘录中的系列条目就是从这两本小说开端的。他竟然在五月十七日写信给弗吉妮娅·伍尔夫，坦白承认他是头一次读《项狄》和《摩尔》，而且天真地求她开列一份“最好小说的清单”。^①不过，就算是他没全读过这些小说，我想他对这些小说可能具有的真实面貌也该有个比较清楚的概念，不会像他装得这么无知。不管怎么说，既然他当时就将弗吉妮娅·伍尔夫正式发表的一种观点斥之为“乏味无聊的布卢姆斯伯里式结论”^②，可见他也并未深受伍尔夫个人推荐意见的左右，如果她果真给他开过什么书单的话。

如果说福斯特事先就因他的讲座那“颇令人坐立难安的荣誉”而“大惊小怪”，那么事实的结果是第一次讲座就“好过我的预期”，到第二次他觉得听众“兴味盎然”了，而到了第三次，讲座已在“剑桥博雅君子中大受欢迎”，到第七讲则是“风靡一时”，到最后获得了“最了不起的成功”，结果“日胜一日的盛名都使我无暇”写信了^③。福斯特

① 我只见过这封信的抄件。——编者

② 见本书 208 页。——编者

③ 见写给以下诸位朋友的信：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致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九日致 C·P·卡瓦菲斯(希腊著名诗人。——译者)；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致多拉·卡灵顿；一九二七年二月二日致爱德华·阿诺德；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致 T·E·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译者)；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致 E·V·汤普森；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再致 T·E·劳伦斯。其中某些引文再次深受 P·N·弗班克先生所做的摘录之惠。——编者(一方面号称“无暇写信”，实际上颇写了不少。挺耐人寻味的。——译者)

的系列讲座深受大部分听众的欢迎看来殊无疑义——不过我的两位通信者却是以相当不同的措词来描述这些讲座的，他们好意将自己的回忆录送给了我^①。乔治·瑞兰兹先生聆听过几次讲座，回忆起福斯特“羞怯的微笑是如何突然变为上气不接下气、几乎孩子气的大笑”的，并补充道：

摩根从不妄下断语；他从不空谈教条；从不屈尊俯就或是盛气凌人。最重要的是，他讲话虽说从不提高声调，却也从不含含糊糊。他的讲座，正如他在后来印行的书中所言，是“随兴的，确确实实如话家常的”……继他之后那些最好的克拉克讲座也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获得成功的。他们是在跟你对话，正如摩根后来做的那些最让人难忘的电台节目……他们是在面向“普通读者”娓娓道来。

不过，这位剑桥研究员的“证词”恐怕会被我的另一位通信者 F·R·利维斯^②博士给逐出法庭，利维斯博士从头到尾聆听了全部八次讲座，他记得自己一直被“讲座智识上的虚妄所震惊”。对他而言，福斯特之所以受到大量听众——“自然只是他的听众”——“显然意气相投的欢迎”和“骇

① 瑞恰慈教授当时恰巧离开剑桥，进行他的“环球蜜月漫游”去了。——编者

② 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 1895—1978)，英国文学评论家，长期在剑桥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主要论著有《英国诗歌的新方向》、《伟大的传统》等。——译者

人听闻”的成功，只不过因为这些观众大多不过都是“剑桥那些愚蠢教师的妻子及她们的朋友”组成的（这就是福斯特所谓的“博雅君子”？），虽说也有“不少男性教师到场，包括本人年迈的导师（身在国王学院）——难怪人家都说国王学院的人总是愚忠了”。利维斯博士将所有这一切均看作“启蒙那强有力的正统”的明证，他继续道：

继而出版的那本书也马上成了桩公害：全英国女子学校的那些英语女教师全都抓住所谓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区别不放——毕竟，这区别也并不比书中认真做出的任何结论更糟糕。我是作为哥顿和纽纳姆^①“英语”教育的前主要负责人说这番话的。

有人也许会顺带提出反例，因为利维斯博士在别处也曾认为《小说面面观》^②在文学评论上并非全无建树，至少福斯特这本对梅瑞狄斯“必要的拆台之作”省得这位《伟大的传统》^③的作者在这上面大费周章。不过，对《面面观》持严厉态度的并非只有利维斯博士一人，也确实到了对《小说面面观》被指责的缺陷认真讨论一番的时候了。

① 哥顿(Girton)和纽纳姆(Newnham)是剑桥分别于一八六九和一八七二年最早专为女性设立的两个学院。——译者。

② 福斯特的讲座以此书名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日分别由爱德华·阿诺德和哈尔科特·布拉斯在伦敦和纽约同时出版。——编者

③ 伦敦, Chatto & Windus, 1948; 见企鹅版 33 页。——编者

我上文已经提到，福斯特在某种程度上处在一种违心的位置：他受雇成为一位评论家却又对文学批评的价值持严重怀疑态度。进退维谷中，他试图通过提供一种他觉得最为温和和“无害”的批评以求摆脱困境，有时对“全部这一套”表示质疑，而且一开始就以全部火力针对他反讽地自称亦属其中一员的“伪学者”开炮。他的立场暧昧可疑吗？J·D·贝尔斯福德认为确实可疑：他在针对这本书的书评^①中说，福斯特给人的印象是

他真巴不得把方帽和长袍整个儿全丢到爪哇国去，并且宣布在所有的文学批评经典中没有一个原则值得上两便士……可是在一个大学讲堂是不能公开鼓吹无政府主义的，而且福斯特先生也得尊重已故威廉·乔治·克拉克的遗愿。慎重是必不可少的，它是衡量是否庄重的一个标尺……

如果说在贝尔斯福德看来，据我推断，令人遗憾的特征在于不够庄重，那么在福特·马多克斯·福特^②看来则是无政府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不敬。他的书评标题“剑桥评全

① 《新两兄弟》(New Adelphi, 期刊名典出古罗马剧作家泰伦提乌斯所著之社会喜剧 Adelphi。——译者)一九二八年六月, pp.366-367。——编者

② 福特(Ford Madox Ford, 1873—1939), 英国小说家、编辑、批评家, 二十世纪文学界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 主要作品有《好兵》、《行进的目的》四部曲等。——译者

部这一套”^①就表达出他对福斯特戏谑地应用这个词儿的愤怒。他将福斯特对“给予他荣誉和名望的艺术和技巧”的态度等同于《笨拙》杂志对“人生那些严肃问题”的态度，并继续道：

福斯特先生的表现是，他非但是位小说家，还是位牧师，在这部作品中，他仿佛一只手举着“圣体”，另一只手同时在写有关这圣饼是如何烤出来的卖弄学问的俏皮话。

这个智识虚妄的福斯特，这个懦弱卑怯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个亵渎神灵的牧师：这就是这位小说家从创作转向批评时对他劈头盖脸的指责——而且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拒绝伟大”，通常^②这被视作亲切友好，表现在他的小说中就更加令人赏心悦目了。不过，用福斯特并无意创作或仿效的那些皇皇大著的标准来挑剔他这本薄薄的小书，怎么说也有点小题大做吧？也许，更加中肯的批评倒是出自萨默塞特·毛姆《寻欢作乐》的叙述者之口：

-
- ① 《星期六文学评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449—450页。——编者
这篇书评的英文标题为“Cambridge on the Caboodle”，福特不满的那个词儿就是“caboodle”。——译者
- ② 虽说发明这种说法（见《E·M·福斯特》，伦敦，Hogarth Press，1944，10，155页）的利奥奈尔·特里林并不这么认为。——编者
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美国文学评论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译者

我读了珀西·卢伯克的《小说的技巧》，从中我学习到写小说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像亨利·詹姆斯那么写；后来我又读了E·M·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从中我学习到写小说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像E·M·福斯特那样写……

我觉得对于卢伯克的著作而言这绝对是一语中的；而且，虽说我觉得对福斯特而言稍有不公，它至少以其有趣的夸张方式暗示出《小说面面观》是本什么样的书：它是一系列经观察后做出的点评，在编排上有些随心所欲（一直到附录A中那些笔记临近结束时才第一次出现了一点迹象：福斯特那“摇摇欲坠的教程”竟然也是有其结构和框架可言的），而这些点评首先是由一位小说家，其次是由一位稍有些不太普通的读者，再次是由一位朋友，最后才是由一位进行分析和理论化的批评家做出的。再次是朋友，最后才是批评家。因为必须承认，福斯特是从来不吝于为了友谊牺牲批评的，在《小说面面观》中就有三个清楚的例证：毫无必要地吹捧（这既非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狄金森^①的《魔笛》；对珀西·卢伯克的两本书他私下里颇不以为然，公开场合却尽是溢美之辞^②，对一位国王学院的同学他也同样“表里不

① 狄金森(Goldsworthy Lowell Dickinson, 1862—1932)，剑桥古典学者，福斯特的朋友。——译者

② 见85—86, 167—168, 202页。而且一直到一九四四年，福斯特还向他的印度听众推荐《小说的技巧》；见那次令人失望、了无新意的播音“小说的艺术”，本书附录D全文收录。——编者

一”，自然也是出于对这位仁兄的忠诚和感激，后者一九一八年在红十字协会做他上司时，曾在一次有关组织管理的争论中坚决支持过他；再有就是他“出于一个小小的个人理由决定不送给伍尔夫太太未经更正的校样；其中有一个对她自己作品的批评，我已经在改样上修正过了！！”^①对此我们有权不以为然——福斯特不是明确表示过宁肯叛国也不肯叛友吗——却没理由感到意外：人先于艺术是福斯特终生服膺并时常念叨的信条之一。

即便如此，《小说面面观》有时仍具有令人激愤的力量——福斯特本人就很有数：“我希望在有关司各特的问题上激怒某些人！”他论道。司各特的追随者自然是轻易上了钩^②，司各特之外，他对别的很多作家的批评也引来众多辩护之声，亨利·詹姆斯的追随者更是针对福斯特的攻击在一切问题上捍卫他们的大师，他们为此花费的篇幅至少是福斯特的八倍^③。如果一本批评著作引不起任何怨言，肯定沉闷无比；以下是我认为几个值得商榷之处。就从詹姆斯

① 致布里安·费根(爱德华·阿诺德出版公司福斯特作品的编辑)的信，一九二七年九月二日。——编者

② 特别是本书的几位书评作者，以他们对福斯特的友善程度排列：L·P·哈特利(《星期六评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弗吉尼亚·伍尔夫(《国民与雅典娜神庙》，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及E·F·本森(《观察家》，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这三篇评论均可见于那本珍贵的汇编《E·M·福斯特：批评之遗产》，菲利普·加德纳编(伦敦，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3)。——编者

③ 比如，可以参见杰弗瑞·提洛特森的《批评与十九世纪》(伦敦，Athlone Press, 1951, pp.244-269)。——编者